



乎换了一个人。事后想想，他的观点大多数是正确的。

他对我脾气发得最厉害的一次，是2010年春节后，还是因为论文。春节之前，他就对我说过：“在你回老家过年之前，你把博士论文初稿拿给我。我在寒假里给你好好看一看，改一改。”因为回家比较仓促，我就想：“先生寒假里要看的论文很多，除了我，还有四个学弟学妹的论文都是要他看的。干脆，等春节过后再给他看吧。”没想到春节回来，和他第一次见面，他竟然大发雷霆，要我今年不要参加论文答辩了。在他看来，凭我当时的论文质量，参加论文答辩只会丢安徽大学历史系的脸。我被骂得大气也不敢出，等他气消些，我就说了没给他看论文的初衷，他的脸色稍微好转了些，但依旧阴沉。我把论文交上去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他的“裁定”。过了近十天，他打电话让我过去，把修改过的论文交给了我。论文底稿上全是他添加和删改的内容，可见他把我这篇近二十万字的论文看得非常详细。那天，在他的办公室里，他一直辅导我，直到下午一点多。我们俩都没有吃饭，事后我想请他下餐厅，他拒绝了，说下午还有个会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推着他半旧的自行车回去了。

博三那年春天，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：论文压力大，还要养家糊口；最严重的是，我当时已经36周岁，无论进高校还是报考公务员，都超过了35周岁的限制年龄。那段时间，找工作处处碰壁，我非常消沉。临近毕业，有两件事，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。一是张先生请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博研究生吃饭，在酒桌上，我借酒浇

愁，喝多了。借着酒劲，我说我一生中做错了两件事：一是不该读硕，二是更不该读博。硕博六年，放弃了原先稳定的工作，如今工作无着落，对不起家庭和孩子，悔之晚矣。酒桌上原先热烈的气氛突然冷寂，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然后猛灌下一杯白酒。论文答辩后，他对我说：“当时我听了你的话，沮丧而无奈啊。我虽然理解你的处境，但实在无能为力。这段时间，我心里一直很难受。”他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我。还有一件事，是他给我最后一次指导论文的时候，问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，我说仍旧无着落，绝望透顶。他叹息着说：“昨天我参加全省的史学会议，在各个学校的历史系主任面前都提到过你，希望能有高校接收你，但没有一个学校今年要历史文献学博士的。可能我的面子还不够大。”他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，我也实在无话可说。我知道，他为了学生是可以不顾一切的，就像之前曹金发师兄毕业找工作的时候，张先生为他出面甚至不惜得罪了某高校的某位领导，最终事情成功。他对学生是真诚的。我找工作，他实在没法再帮到忙，因为人家不可能无限制地给他面子。好在我最终有了工作，他才放下心来。

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学生都顺利通过。他很高兴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现在可以‘弹冠相庆’了。”这句话，在不同场合，他对我们足足说了三遍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学生的成功，就是他的欣慰。

博士毕业后，我去了遥远的浙江，离开了安大校园。暑假，我去合肥，在校园里遇见了师娘，她告诉我先生到内蒙古去了，我就再没

有见到他。在浙江工作期间，我给打过几次电话，他关切地问我浙江生活得怎么样，我告诉他挺好，小康之家，衣食无忧。他很高兴，一再叮嘱我好好干。

先生曾对我们说过，如果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，安大历史系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能够批下来的话，此生无憾矣。如今，先生的愿望实现了，可他却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？

先生的离世，是如此突然，谁也没想到。他有脂肪肝，学生们都是知道的，但没有人想到他会猝死于心肌梗塞。先生就这样走了，突然而又平静，恰如他的为人：在学术界名声卓著，但生活中从不张扬。

打开电脑，搜寻安大网站：2011年12月23日，先生还给学生作了《关于楚汉之争几个问题的新思考》的讲座。网站上还附有他的图片，图片上的他神采飞扬，恰如过去给我们授课的时候。如今看这些图片，留给我的，只有无尽的酸楚和凄怆。

……

光阴似箭，时光无情，带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。张先生去世，距今已经整整十年，这十年，母校历史系的学子，估计已经淡忘了先生。是的，先生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当年走在安大校园里，没有人会想到他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；如今，先生走了多年了，人世间已经逐渐淡褪了他的生活痕迹，但他留下的丰硕学术成果和对母校历史系的贡献，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桐乡市高级中学）

责任编辑 李 淳